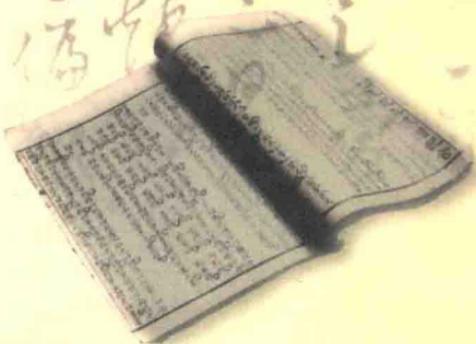


贵州师范大学

风采

百年



贵州师范大学

学者风采

贵州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2001 · 8

前　　言

贵州师范大学创办至今，已经 60 个年头。60 年中，在这块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用心血培育人才之花的学者们，为学校、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治学精神、为人风范、学术成就，为贵州师范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后来的一代代师大人，不能不由衷地感激他们、敬仰他们。

今天，在庆祝贵州师范大学 60 华诞的活动中，我们将这本《贵州师范大学学者风采》奉献给大家，希望人们能从这些平凡、简略的文字中，窥得学者们的种种风采神韵，并由此体味学术与人生的真谛，获得深刻的启迪；更希望更多的学者在师大涌现出来，大展风采，创造更加绚丽、壮美的未来。

编　者

2001 年 8 月

目 录

执教终身的古汉语学者王佩芬	(1)
文字学专家向义	(6)
草创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的王克仁	(9)
把生命融入校园的黄国华	(12)
著名化学教授谭勤余	(16)
一代良师李俶元	(20)
闻名全国的数学教育家刘薰宇	(24)
现代教育家、数学家萧文灿	(26)
英年早逝的知名学者谢六逸	(39)
博极群书、著述宏富的张汝舟	(63)
宽厚长者王驾吾教授	(71)
英文、中文“两栖教授”朱厚锟	(75)
力行垂范的赵咸云	(78)
治校治学殚精竭虑的陈若夫	(81)
著名生物学家顾光中	(86)
潜心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戴自俺	(92)
黔中宿儒李独清	(102)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杰出战士康健	(108)
力学专家陈建勋	(117)
卓有建树的史学家周春元	(120)
知名体育专家杜化居	(129)
著名物理学家张永立	(132)
“全国优秀教师”王学孟	(134)
史学大师项英杰	(138)
学界奇人许庄叔	(143)
喀斯特地貌及洞穴学家张英骏	(150)
伉俪学者、翻译大家杨宪益、戴乃迭	(157)
矢志教育、奋斗终生的周应培	(175)
醉心国学、拓荒方志的王燕玉	(178)
贡献突出的著名历史学家吴雁南	(185)

执教终身的古汉语学者王佩芬



王佩芬，号梦淹，原名葆彝，1887年1月3日生于贵阳。先世居浙江绍兴，19世纪中叶迁来贵州省，以后定居贵阳。有兄弟姊妹11人，他排行第九。其父虽以经商为业，却和一般商人不同，是一位有眼光、懂医道的商人，为了培养子女读书，有时即使典卖物品购书，亦在所不惜。其兄王蔬农、王仲肃都是满腹经纶、学识渊博的人。在家庭的熏陶影响下，王佩芬自幼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少年时即能背诵《说文解字》部首，青年时考

取秀才。家里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考中状元，光宗耀祖。但他却放弃了“玉堂金马”的梦，1905年18岁时考上了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到日本后，初入东京弘文学院从松下大三郎先生学日文，后升入早稻田大学学博物学。他留日期间，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革命党人孙中山、章太炎、秋瑾都在日本从事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革命宣传活动。王佩芬曾去听过他们的讲演。作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在日本还开过《说文解字》学术讲座，王佩芬也去听过。使他眼界大开，觉悟倍增，深感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地大物博的祖国的羸弱，同情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

王佩芬返筑后，即献身于教育事业。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只有科学发达才能救中国，中国才能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彻底摆脱贫任人宰割的局面。而提高科学水平则需从教育入手，

舍此无他。抱着“科学救国”的主张，他全力以赴地投入教育工作，曾在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日文 15 年，又在贵阳模范中学、南明中学、省立女师等中等学校教授英文、博物、国文达 24 年。即使在周西成主黔时期（1926—1929 年），他被聘为省政府外文秘书，仍然在省立女师兼课，从未脱离教学。1921 年，王佩芬因在省城教育界很有声望，被聘为模范中学（后改为省立第一中学）校长。5 年中，他励精图治，采用新式计分法，扩大学校图书馆，把学校办得有条不紊。1929 年，王佩芬在贵阳地方人士支持下，创办贵阳县立中学于炎帝宫（其地即今贵阳五中所在地），出任首届校长 7 年，与著名教师许肇焱、黄耀初被贵阳教育界人士赞誉为“县中三杰”。他提出县中的校训为“敬业乐群”，标语是“科学救国”。他说：“训以‘敬业’，欲诸生之养成其责任心也；训以‘乐群’，欲诸生之养成其团结精神也；以‘科学救国’为标语，欲诸生之悉心研究科学，而应用于民生与国防也。”贵阳县中的成立，结束了近代贵阳县没有中学的历史，是贵阳近代教育史上一大盛事。

1935 年，国民党确立了在贵州的政权，结束了贵州军阀主黔的历史。当时，贵阳县长曾学孔一上任就打算停办贵阳县中，而把久经划定作为县中的教育专款移作他用，借便图私。王佩芬十分气愤，在县中的一次纪念周集会上慷慨陈词，痛斥曾学孔的倒行逆施，于是县中学生群起大闹县政府，与曾学孔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在贵阳各界人士支持下，县中仍然保存，只是将高中二、三期归并省立中学，曾学孔亦被撤职。王佩芬不愿作傀儡校长，事后即断然辞职，于 1936 年出走南京。

到南京后，他先在南京宪兵学校教授日文，后又到贵州同乡王伯群创办的上海大夏大学任教。第二年，抗战军兴，他随大夏大学迁到贵阳。自 1938 年起，一直担任大夏大学中文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希望继续为桑梓服务，未随大夏复员，而转到贵州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47 年，他转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

任系主任。次年辞去兼职，专任教授，直至贵阳解放。此外，自 1949 年起，王佩芬还兼任私立程万中学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佩芬为能实现其“科学救国”的理想，曾积极筹设私立阳明学院。他想以阳明学院造就理工科人才，以供将来开发贵州资源之用。举凡联系绅耆，求助官府，团结科学专家，寻觅办学地址，他都亲自筹划，竭尽全力奔波。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1949 年 11 月贵阳解放。次年，王佩芬辞去程万中学校长职，专心在师院中文系教书。他亲眼看到自己过去的理想在人民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得以实现，甚感欣慰。从切身体会中，他逐渐认识到科学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才能得以发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在古稀之年仍然满怀热情，认真负责地耕耘在大学讲台上。1956 年，王佩芬曾赋诗抒情，其中有“扩充眼界前头望，行见花明万里春”句，说明他对祖国和个人的前途，都充满着美好的憧憬。

解放后，王佩芬在大学执教 20 多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穿着朴素，始终是一身蓝布长衫。他性格开朗，讲课生动而诙谐，又平易可亲，深为学生敬重。在教学中，他主张“宽取窄用”和“深入浅出”。在大学，他先后讲授过“国文教材及教法”、“中国语文教学法”、“历代散文选”、“历史文法”、“现代汉语”、“古汉语”、“专书选读”、“读书指导”、“工具书使用法”及日语等多种课程。“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无理批判，甚至被抄家，但他没有垂头丧气，还是乐观地看待未来。

王佩芬是近代贵州的著名学者，他的一生始终保持着书生本色。他学识丰富，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素，尤长于汉语声韵、训诂之学及古今汉语语法，还进行过贵州苗语和汉语的比较研究；对于自然科学的矿物学、生物学等亦有所长。他懂日文、英文、俄文，尤以日文、英文为精。在旧社会，他的许多同学和学生身任要职，不少人曾劝他弃粉笔生涯而从政，并许以高官厚禄，他却依然故我，矢志

教书,不为所动。王佩芬酷爱藏书,为购书常陷入经济困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历来都为买书贫”。他治学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主张“博闻而强志”(强志即强记),他认为“不博闻,则知识面窄小;不强志,过目即忘,等于不学。”在他书房中贴满各种纸条,将要记的东西写上,随时朗读背诵。王佩芬 50 多岁开始学习古典诗词,后来果然能写出受人称赞的好作品;他 60 多岁开始学俄文,终于做到能阅读俄文书籍及做简单的笔译;他 70 多岁开始进行文字改革研究,垂暮之年还在伏案撰写《贵州省怎样试行汉语音文的研究》一书。凭着坚强的毅力,他学会许多原来不懂的东西,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为治学献出了一生。

王佩芬勤于著述,其中重要的有《国文积句公式》、《识字法》、《贵州方言考》、《说文解字部首疏证》、《名学津逮》、《先秦名理探》、《和文猎要》、《英语构造及分析图式》、《结晶学入门》等,他又翻译了日本寺尾新博士《增殖生物学》一书。

王佩芬勤学好思、博学多才,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学生“诲人不倦”。他留日学的是自然科学博物学,但由于家学渊源的影响和深厚的国学根底,所以他后来的著作多在语言文学方面。解放前,王佩芬在贵大、师院任教时,曾用科学的方法,探索作文的规律,著有《国文积句公式》、《文章作法》,由中正书局公开出版发行。解放后,王佩芬还编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讲义。在这些讲义中,留下了他多年研究汉语的心得。王佩芬雅好中国古典诗词,平时历代名家诗词不离手,学有心得常及时记录于随身携带的自制的册页式的卡片上。对于一些古诗词名篇、古文名篇,他到耄耋之年,依然能琅琅背诵,让后生晚辈们十分佩服。王佩芬与著名教授李独清、向义及贵州学界名流相聚时,常诗词唱和,一生著有诗词数百首。在教学方面的特点是深入浅出,语言形象通俗,生动活泼,常旁征博引,充分论证,使学生学到许多书本外的知识,扩大了知识面,活跃了思维。由于他会多种外国语,所以当时俄语系开的“现代汉语”

课,教研室总是派他去教。教学中,王佩芬发挥其优势,经常进行中外语言同异之比较,对俄语系学生学好汉语、学好俄语都有极大的帮助,很受学生的欢迎。王佩芬对系上青年教师的进修提高也很关心,凡有请教,他都倾其所知,给予解答,毫无保留。有的书当时买不到而又为进修所需,王佩芬常无私地借给或赠予系上的青年教师。60年代初,学校由陈若夫院长负责大抓青年教师的进修工作,七十多岁的王佩芬还积极担任中文系日语进修班的教学工作,无论天雨天晴,白天晚上,他都按时从校外赶来上课,从未缺席、迟到、早退过。教学中,他常向青年教师们介绍学日语、英语、俄语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和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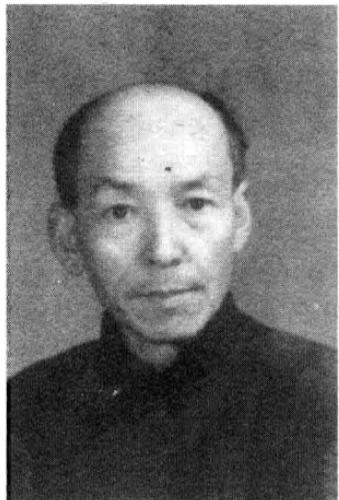
王佩芬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主动将数十间私人住房交公。1973年中日恢复邦交,他欣然书写长律《樱花吟》,希望两国“子孙同勉”,并祝中日“国运共隆昌”。又将此诗用优美的小篆写成一巨型条幅,装裱后送省博物馆参加书法展。后又被选送到北京参加中日书法家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举办的书法联展。

王佩芬为人正直真诚,心胸豁达,性格开朗而幽默。更令人佩服的是他敢于讲真话。文革初期,系上揪斗当时的副系主任张玉麟,有人要王佩芬表态。他说:“我和张先生交往几十年,我觉得他是我们中文系不可多得的好教授……”。话音未落,当场就被揪上台去陪斗。事后,有人对他说:“老师,你怎么这样不识时务,还说那样的话?”他认真地说:“我怎么能昧着良心乱说?”

1973年王佩芬因病逝世,终年87岁。他去世后,家属遵嘱将他的全部藏书捐赠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其中仅各种工具书就不下百部。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由于师院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人们为他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追悼会,这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

执笔 何静梧 黄大荣

文字学专家向义



向义，字知方，号六碑，贵州省贵阳市人。生于1892年2月3日。1907年进贵州省公立中学（贵阳一中前身），后转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插班考入北京京师政法学堂三年级。辛亥革命后返乡，与贾公台先生创办“私立志道小学”（今贵阳市省府路小学），任董事长。参与修纂《贵州通志》。曾任贵州省视学。此后在贵州省立模范中学、贵阳高级中学、贵阳女子师范学校、贵阳师范学校教过国文。他学识渊博、教学认真、对工作一丝不苟，省内学校争相聘请。

1941年王克仁受命筹建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向义参与筹建工作，任院长秘书，兼中文系教师。为了专心于中文系的教学工作，向义主动辞去院长秘书，主讲过“文字学”、“元明清小说戏曲选”、“训诂学”、“古汉语”、“古代文学”，还为青年教师开设“书法讲座”等课程。并著有《中国文字形态变迁史稿》、《石鼓文丛考》、《黔语》、《中国方言研究》、《方言虚词集解》等书。1956年，学院成立“院务委员会”，被选为委员。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过贵州省第一、二届政治协商委员会。

向义从事教育工作60载，桃李遍黔中。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教学经验丰富、讲义精炼准确、讲课主题突出、妙趣横生。《文字学》讲义分上、下两册，白话文，蝇头小楷，深入浅出。在学生

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向义晚年体质较弱，上课时常要含着洋参才能讲完课。

向义对文字学和方言造诣很深，考证缜密，常能发人所未见。如讲贵阳小吃“肠^血面”的“^血”（今写成旺，误也），说上面一个“亡”字，下面一个“血”字，死了的血便是^血，音接近，表音又表意。又如讲“聖”人的“聖”字，左上从“耳”，以耳听也；右上从“口”，以口述也；下面从“王”，说明表达的意见高于众人。再如讲贵阳方言“眨眼石”，过去贵阳的道路是用石板铺成的，高低不平。下雨天，踩着不平的地方就会溅出污泥，像眼睛一眨一眨的，故为“眨眼石”。这些例子形象生动。数十年后的今天，学生们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向义处世平和、平易近人，从不摆教授架子，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下课十分钟，都争相找他问典故、问名人轶事。他有问必答，百问不厌。五六十年代，他除担任“古汉语”教学外，还承担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经常都有一些老师去他家上课。

向义治学刻苦，对文字学钻研尤深，著述甚丰。著有《石鼓丛考》、《贵山联语》、《六碑堪联剩》、《味味集》（又名《黔联三百首赏析》）、《谜语考》、《联语考索》、《翰墨怡情》、《隶法集说》、《文言虚词汇参》、《贵州方言》等。

《石鼓丛考》是向义倾注心血的力作。抗日战争时期，遇空袭警报，他就抱着这部稿本，带着家人外出躲避，其余都可不要。

石鼓是我国最早的刻字文学，又名“猎碣”，是歌咏国君游猎情况的。对于远古社会的研究历史分期，乃至文字的演变等等，都有极大的研究价值。郭沫若先生认为石鼓为秦刻石。向义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对于其它各家之言，也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石鼓丛考》这部著述，网罗群言，悉心考证，分前后两篇。前篇是考证，后篇为考释，全书计 55 万字，是文字学上最宏博的参考书。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应贵阳师范学院的邀请来筑讲学时，看到书稿，就给予高度赞誉。抗战时，闻一多先生路过贵阳，向义请他

为《石鼓丛考》作序。闻一多对书稿给予充分肯定,但因兵荒马乱,还是婉言辞谢,却以两枚印章相赠,以示友谊。

向义经常流连于贵州山山水水之间,有不少文学创制,手稿虽多散失,但还能整理出《六碑堪联剩》一书。

六碑堪,简称六碑,是向义的号。因向义出生在贵阳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大坝子(今民生路一带,类似如今的人民广场)。坝子上有明初的六座碑,镶砌在墙上成龕,故以此为号。向义晚年还有另一别号——“青花十砚斋”。他因卖屋买下十块端砚,不仅写了“得砚歌”长诗,对每块砚石还另有趣诗,如对一块有鵝鴨眼的题云:“眼波横,天花坠,石能言,善为媚”。在《贵州文化出版名人传略》(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一书中,向义被称为:“现代文字学家——专心于教育,对中国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很有研究”。

向义还是楹联大师。江西大学龚联寿教授(楹联学界权威,著《中华对联大典》)称他“在联语方面的成就,在近现代学者中,当属仅见。”由龚教授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的《联话丛编》是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该书将向义年轻时著述的《贵山联语》收录。《贵山联语》计15卷,集全省楹联千余条,对研究贵州文化有重要价值。

执笔 向 芹

草创贵阳师范学院的王克仁



王克仁，贵州兴仁县人，生于 1894 年 3 月 26 日。4 岁时，其父为使他受到更好的教育，举家迁到贵阳。他 10 岁以前在家受父亲教育，读四书五经。1904 年进贵阳达德小学，1908 年进贵州省公立中学。1911 年，王克仁中学毕业，参加黔军北伐。1916 年，王克仁考入南京高师。1918 年后入南京高专攻教育。1923 年 7 月，王克仁于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

1924 年于该院毕业，取得硕士学位。1941 年受命筹建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1950 年至 1957 年，在贵阳师范学院担任《世界教育史》的教学工作。1957 年后到天津休养。1981 年 12 月 27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不幸逝世，终年 87 岁。

王克仁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教学工作。1914 年至 1915 年 8 月，在湘西黔阳女子小学任教员。1917 年至 1918 年，在湘西洪江旅外黔人子弟小学任教员。1921 年至 1923 年，在南京高师附中任教员，同时又在东南大学继续深造。1924 年至 1925 年，在成都任高等师范教授兼教务主任。1925 年至 1926 年，在福建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教务主任。1926 年至 1927 年，在上海真如暨南大学任教授兼初中部主任。1927 年至 1928 年，在江苏无锡中学任校长。1928 年初至 12 月，在广西教育厅任讲学专员。1929 年

至1930年,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任党义教育科主任、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委员。1930年4月至11月,在日本东京任驻日留学生监督。1931年4月至7月,在河南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任教授兼教务主任。1931年8月至1933年7月,在厦门大学任教育学院教授。1935年8月至1936年7月,在湖北省教育学院任教授。1937年2月至7月,在福州任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38年9月至1939年7月,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授兼出版主任。1939年8月至1940年12月,在重庆大学任教授兼训导长。1941年1月至7月,在贵阳农工学院任教。1941年8月至1943年7月,任贵阳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1943年8月至1945年3月,在贵州大学任教授。1948年8月至1949年12月在重庆任教育学院教授。1950年8月至1952年12月,在贵阳师范学院任教授。

王克仁一生热爱教育事业。这正如他在《我为什么从事教育事业》一文中所说:人生从事教育实在富有意义,这意义不是因办教育可以使人富,使人贵,使人有什么权威,而是因为教育包涵着最深厚的热情。教师之训诲子弟,正和父母之养护子女,全是一样的心理。教师与子弟,其间全是一种热情在交流,人生才会感到富有意味。第二、我们该看出人生从事教育,实在有着很大的价值,这个价值断不是什么金钱之类的东西可以衡量的。从事教育,是扶持国家的生命,是兴盛一切的事业,是延续民族的文化。第三、我们该看出人生从事教育快乐真是无穷得很。我们教育子弟,自然比农夫种植还要费心,还要淘气,然而我们果真培植了一些子弟出来,使其对于国家社会有了些微的贡献,我们所享的安慰,所得的快乐,是无可比拟的。王克仁不仅热爱教育事业,而且特别喜爱师范教育,认为师范教育极有意义,从事师范教育的人要有更远大的志向与崇高的精神。他在《我们为何要重视师范教育》一文中说:我们提倡师范教育,要塑造一些人才出来,肯到中小学校,担任儿童和青年的教师,可以说是要为生民活命,要为国家培力,要

为世界谋幸福,要为天地施化育。凡去从事这种工作,先要审查自己究竟有没有伟大的志愿,有没有耐苦的精神,和有没有坚贞和慈爱的德性,断断不好想到物质的报酬同享受。王克仁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具有创造开拓的精神。如1950年他在贵阳师院工作时,教过《世界教育史》和《教育学》课程,但这些学科在当时还没有翻译的教材出版,而国内也没有相应的教材。王克仁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联系实际地进行教授,为当时的教育教学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王克仁在学术上也有建树,他早年曾著《西洋教育史》等著作。著作结构合理,观点清楚,材料翔实,分析论述得当,这在当时缺乏相关教育资料的情况下,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外国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王克仁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特别是在筹建贵阳师范学院的过程中,在当时物质设备及师资条件极为缺乏的条件下,他奔忙于各方,邀请各方人士、学者出主意、想办法,终经多方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与志士仁人创建了贵阳师范学院。可以说,王克仁在贵阳师范学院的创建与贵州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王克仁为人谦和,尊重他人,平易近人。虽然他在晚年时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仍然谦和慈祥,极具学者风范。1978年,王克仁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疾病缠身,但是他仍惦记着我省的教育事业,惦记贵阳师范学院,希望能回来看看,可终未成行,是为憾事。

执笔 余俊书 范向阳

把生命融入校园的黄国华



黄国华，字宝初，号公晋，1894年12月24日出生于台湾省新竹县关西镇深坑乡。祖籍广东省梅县丙村。先祖于明末随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台湾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因家境贫苦，自幼一边读关西国民小学，一边帮助家庭劳动，从小就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小学毕业后由其在日本轮船上当杂工的舅父带往日本求生，在本州的爱知县边打工边读书。1914年毕业于爱知中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在校刻苦学习，

于1918年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蚕桑专业。学校要留他任教。当时他有一位要好的同窗，系贵州籍人士姚天沃。两人过从甚密，劝其一同返回贵州，帮助发展教育及蚕桑事业。正值此时，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熊廷岩（述之）在日本考察实业，知此情况后即聘黄国华来贵州工作，他当即表示愿回祖国，到贵州贡献自己的力量。

黄国华回台省亲后，于1918年11月起程来黔工作。历时二月有余，到达贵阳。拜见熊廷岩后，被委派在油榨街贵州省立农业学校任教，并兼任贵州垦殖局顾问。在此期间，除教书及为发展蚕桑事业尽力外，还在垦殖局所辖地区图云关一带荒山上植树造林。每当清晨6时便带领农校一位工友，前往该地种植各种苗木，现今图云关森林公园中的一些林木即为他当年所种植。《贵州科技